

【语言与文学】

DOI: 10.15986/j.1008-7192.2015.05.018

# 文学研究会对近代俄国文学译介和接受中的误读

李文革

(陕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到了五四时期,主要是20年代前期和中期,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出现了“极一时之盛”的译介局面。文学研究会的精英人物如周作人、茅盾、郑振铎等看准了译介俄国文学对当时中国时局和文化建设的意义和价值,率先倡导和大量译介俄国文学到中国。他们对近代俄国文学的接受、俄国现实主义流派以及俄国作家和作品的解读都是从实用性的视角进行的,注重和强化了近代俄国文学中蕴含的鲜明人道主义、写实主义的风格和对中国现实的指导意义和价值。这种误读是以文学的功利目的为导向,适应了五四时期中国的社会文化转折期的内部需求,使中国的新文学创作和发展有了可资借鉴的资源,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

**关键词:**文学研究会;近代俄国文学;译介;接受;误读

**中图分类号:**B 08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15)05-0083-06

到了五四时期,主要是20年代前期和中期,“俄罗斯文学的爱好,在一般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一种风气,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革命的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一种运动”<sup>[1]</sup>。文学研究会的精英如周作人、茅盾、郑振铎等非常重视俄国文学的译介,在文学研究会所主办的刊物如《小说月报》《文学周刊》《文学旬刊》等刊登了大量译介的苏俄文学作品和文学史实类文章,还推出了五期俄国文学研究的专号、纪念文章、专题文章等,为苏俄文学的译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译介和接受的同时,对于近代俄国文学的流派、作家及作品等多有误读。本文对文学研究会对近代俄国文学译介和接受中的误读进行探析,以请教同仁。

## 一、文研会对近代俄国文学接受中的误读

自1903年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当时的译名是《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又名《花心蝶梦录》,由上海大宣书局出版),进入中国后,人们发现列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等俄国大师对中国普遍有好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在巴黎和会上掀起了瓜分中国的举动使中国大失所望,而苏俄

却放弃在华一切特权,这使中国感到非常亲近。受当时中国时局和迫不得已的现实条件的制约,对苏俄情感上的认同,以及寻求中俄两国文化相似性等原因,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选择和接受了俄国文化。他们把苏俄一部分文学(尤其是近代俄国文学)、理论和社会思潮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引入中国,使得俄罗斯文学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了极盛一时的局面。

李大钊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周作人的《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沈雁冰的《近代俄国文学杂谈》和《俄国文学与革命》、郑振铎的《俄罗斯文学特质及略史》和《俄国文学发达原因与影响》等文章,都充分体现了中国接受近代俄国文学的视野。

1920年11月,周作人在题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的讲演里特别强调中国与俄国文化的“相似性”：“俄国文学的背景有许多与中国相似，所以他的文学发达情形与思想的内容在中国也最可以注意研究”。周作人也特意强调了俄国文学的特色：“含着一种阴暗悲惨气味文人多爱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生活与文学差不多合一”。俄国的近代文学，可以称作“理的写实派的文学，文学的本领原来在于表现及解释人生”<sup>[2]329-333</sup>。周作人指出，“中国

收稿日期:2015-04-1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西部项目“文学研究会的翻译文学及其影响研究”(12XZW019)

作者简介:李文革(1966-),男,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学、语言文化教学等。  
E-mail: wengeli66@snnu.edu.cn

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相信中国将来的新兴文学当然的又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为人生的文学”<sup>[2]331</sup>。这些观点为他后来起草文学研究会的章程并为文学研究会确定为人生的文学宗旨定下了基调。

沈雁冰、郑振铎等文学研究会的精英们,也都是从“相似性”这一接受视野来接受俄罗斯近代文学的。此并非纯粹感情上的考虑,而是有强烈现实功利性目的:从俄国复杂文化体系中筛选出当时中国所需要的启蒙主义文化。茅盾认为:“俄国是文化后进的国家,在文艺上,她是把西欧各国在数世纪中发展着的文艺思潮于短时间一下子输入了进去”<sup>[3]</sup>,这一点,和中国五四输入西洋文艺思潮相似,因此向俄国文学学习正是他们必然的选择。在《俄国文学的起源时》(1921)一文里,郑振铎认为俄国文学在十九世纪大量引进英德文学之后,已种下在垦植得很好的土地上了,渐渐地长成,将含苞欲放了。

只是一味寻求“文化上”相似性欲达到文学的功利性目的,却未从学理上进行分析和论证,造成文学研究会的精英人物在从整体上把握俄国文化特征方面出现了一些误读。比如对俄国文学流派的演进来说,郑振铎、周作人(包括瞿秋白)等普遍把西方文化变化观念套用到对俄国文学认识上来,认为它如西方那样也经历了从古典主义、经启蒙主义或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演化。事实上,俄国文化远不限于同中国的相似性,而是比这复杂得多。追溯俄国文学史便可知道,俄国文学发展靠的是外民族文学力量,卡拉姆津和茹科夫斯基使俄国人熟悉了西方浪漫主义之前文学,并给诗歌确立了将要成为俄国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诗学标准的规范。彼得大帝西式改革才促使文学发展与西方接轨,18世纪产生了真正成型的具有文体意义的俄国文学。俄国现代文化的形成,既与知识界接受德国文化有关,也与官方接受法国文化密不可分。

而李大钊、周作人看重的是俄国文学与中国的启蒙及社会变革的密切关系。李大钊的《俄罗斯文学与革命》(1918)是从激进主义视角透视俄国文化的,着眼点在俄国文学促进革命的社会功用,把文学与革命直接挂钩。周作人早期认为,旧俄作家揭

露沙俄黑暗统治以及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对于当时中国的时局和政治要求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他把俄国文学归为被压迫弱势民族文学(文学研究会称为“被损害民族的文学”),看重的是其中的叫喊和反抗的积极和进步的一面,可以很好地配合当时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这里俄国算不得弱小,但是人民受着压迫,所以也就归在一起了。换句话说,这实在应该说是,凡在抵抗压迫,求自由解放的民族才是,可是习惯了这样称呼,直至‘文学研究会’的时代,也还是这么说……”<sup>[4]</sup>。

对李大钊把俄国文学等同于革命,文学研究会的同仁却普遍赞赏。沈雁冰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俄罗斯》(1919)一文,甚至直接把文学与俄国革命联系起来,声称读者对“托尔斯泰及俄国文学、……作俄国文学略史观可也,作俄国革命远因观,亦无不可”<sup>[5]14</sup>。茅盾在《俄国近代文学杂谈》(1920)一文里说:“俄国近世文学全是描摹人生的爱和怜”,由此“爱和怜的主观,又发生了一种改良生活的愿望”;所以“俄国近代文学都是有社会思想和社会革命观念”<sup>[2]313</sup>。茅盾强化了俄国近代文学中的社会思潮和社会革命观念,就自然而然地拉近俄国文学与中国现实的距离。这一误读完全是从中国当时的社会需要出发来解读和阐释俄国作品的,使得中国学界在译介这些作家和其作品时完全是从文学的功利性视角进行的。郑振铎在主编文学研究会丛书《俄国文学略》(商务印书馆,1923)里总结说,俄国文学研究,在当时革命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一种风气。郭绍虞在1921年《小说月报·俄国文学研究专号》里的《俄国美论及文艺》一文论述了俄国美论与其文艺,是中国第一篇俄国美学研究文献,但是它基本上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革命民主主义理论取代整个俄国美学体系。

## 二、对俄国现实主义流派的误读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俄国的19世纪文学中的文学传统不能笼统地称之为“现实主义”。比如如果戈理小说中的怪诞手法,显然来自俄罗斯民族自身的民间文化特点;普希金、莱蒙托夫以至屠格涅夫的作品,以西欧的标准来看称其为浪漫主义更合

适;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烈耶夫、阿尔志跋绥夫、梭罗古勃、勃洛克等人的作品,也更多的带有现代主义倾向或颓废主义倾向。但是因为俄国现实主义作家把自己个人的命运和艺术与国家民族的兴亡盛衰联系在一起,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参与意识,力图用自己的艺术来影响社会历史进程,所以中国作家出于自身国情和面临的社会历史使命的考虑,他们也是从现实主义的功利性视角来解读这些作家和作品,这就难免不出现误读。

本着在文化上寻求“相似性”的接受视野,文学研会在对俄罗斯近代文学的译介的一个最大的误读是,忽视了对接受对象即俄罗斯近代文学进行审美尺度和思想力度之过滤,译介了一些通俗易懂而非有价值之作。比如,在《小说月报》的“俄国文学研究”(第十二卷号外)里,耿济之却翻译了俄国普通学者沙洛维甫(今译“沙罗维甫”)的平凡之作《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背景》,因为该文把俄国文学史简化为同农奴制斗争的历史。肖洛姆·阿莱汉姆(1859-1916)是位普通作家,其创作以反对富人同情穷人的廉价道德主义为特色。茅盾却将其平凡之作《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当作名著译介过来(载《小说月报》1922年第12卷)。作为苏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一生出版了许多研究俄国文化和文学意识形态性问题之作,但是耿济之却翻译了他最不成功的戏剧《爱艺术的王国》,而对其经典之作却未译介。像普列汉诺夫之类思想家的力作《俄国社会思想史》、学院派代表维谢洛夫斯基的力作《历史诗学》或库里科夫斯基的力作《俄国知识分子历史》等俄国更有价值的著作,文学研究会同仁则对其未加以译介。

文学研究会同仁在理论的解读上把文学工具化,使文学逐渐远离人文主义而走向功利主义。比如,俄国文学理论家克鲁泡特金本来是位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在《小说月报·俄国文学研究专号》里,沈泽民却译介了其《俄国文学批评》(译自《俄国文学的理念与现实》, Russian Literature and Realities)一文,因为该文只推崇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理论家对俄国文学发展的贡献,认为“他们对于当时知识生活曾有过极大而极广极其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能力是任何其他各界中小说家著作所不能企及的”,着

重介绍别林斯基的主张“真实就是现实:必须是人生的诗现实的诗,才是真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主张“艺术的目的是解释人生批评人生”、杜勃罗留波夫的主张“艺术作品只不过是用来讨论某种事实的材料罢了”等简单化的现实主义理论。译介者不仅未加以批评反而采取褒扬和赞赏的态度。更为严重的是,对俄国作家的激进主义的观点,例如别林斯基公开宣称“我所崇拜的英雄是破坏者”等观点,克鲁泡特金无所批评,中国译界似乎毫无保留的予以接受<sup>[6]</sup>。究其实质,就是因为这些俄国作家的思想观点,与文学研究会的“艺术要与人生相关”的宗旨一致因而受到推崇。

对俄国近代现实主义最大的误读是,他们对俄国文学的主流思潮的认识上,都一律冠之以“现实主义”和“人生派”的旗帜;强调俄国文学的写实风格、人道主义和“国民性”特等功利化特点。五四时期中国的文学正处于转折阶段,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启蒙以及文学的新旧转换问题,如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明确提出倡导要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要这样做,文学研究会的精英们意欲从俄国文学文化中寻求可资借鉴的资源。所以,文学研会在对近代俄国文学的译介上大多是从现实主义、为人生和对中国新文学的借鉴意义上来着眼。如茅盾在《俄国近代文学杂谈》(1920)里说:“俄国近世文学全是描摹人生的爱和怜”,由此“爱和怜的主观,又发生了一种改良生活的愿望”;所以“俄国近代文学都是有社会思想和社会革命观念”<sup>[2]313</sup>。这样,茅盾就自然而然地拉近俄国文学的与中国现实的距离。这一误读完全是从中国当时的社会需要出发来解读和阐释俄国作品的。郑振铎在解释当时的俄罗斯文学热时,认为俄罗斯文学具有“真”的精神,是“人的文学,是切于人生关系的文学,是人类的个性表现的文学,是平民的文学,是挣脱了‘团圆主义’束缚的文学”,独长于“悲痛的描写,多凄苦的声音,因我们去寻到文学的真价”<sup>[7]</sup>。他因此提出以俄国文学来“药我们的病体”,并在此基础之上建构中国的新文学。

茅盾在与当时的学衡派代表人物吴宓的论辩中,强化了对俄国近代现实主义文学对中国的借鉴价值。在《“写实小说之流弊”》——请教吴君君,

黑幕派与礼拜六派是什么东西!》(1921)一文里,茅盾认为,西洋的写实派很看重三点;把人生看到非常严肃、对于作品的描写非常认真,不受宗教上伦理上哲学上任何训条拘束。言下之意是,俄国的写实派文学符合写实作品的这三大要义。茅盾针锋相对的指出,西方写实小说中,确实有使人抑郁沉闷的作品,但俄国的写实作品恰好相反,“俄国写实派大家最有名的是郭克里(Gogol),屠格涅甫,托尔斯太,陀思妥以夫所基等四人,他们的作品都有广大的爱,高洁的自己的牺牲的精神;安得谓为‘不健全的人生观’?”茅盾引用克鲁泡特金在《俄国文学的理想与实质》上的话语作为佐证:“克鲁泡特金反对佐拉等人的‘丑恶描写’,说明俄国自郭克里以下的写实文学是‘新’写实主义,和法国的是不同的”<sup>[2]579</sup>。

### 三、对俄国作家和作品的误读

文学研究会在译介屠格涅夫、陀思妥以夫斯基、安特列夫、卜鲁沙夫等近代俄国作家的时候,也更多的是中国现实需要出发来解读其作品的,也存在着一定的误读。

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的作品主要描写精神颓废者的生活、无政府的个人思想和厌世思想,有些也反映了沙皇统治的黑暗。但是不管是译介者胡愈之翻译的《革命党》(1920),还是鲁迅翻译的《幸福》、《医生》和《工人绥惠略夫》,却都对阿氏的消极思想未加以批评,而都从其思想价值意义上予以解读。如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鲁迅在一次的演讲《记谈话》中道出了译介的缘由:“大概,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罢。……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sup>[8]356-357</sup>。鲁迅一生以“人道主义”为指归,以剖析改造国民性为己任,更多的是看重该小说对于中国改造国民性的现实意义。正如学者汪晖所言,鲁迅“重视的是个人的自觉力量对于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重要意义”,而非“除我而外一切与我无关的个人主义原则”<sup>[9]</sup>。

阿尔志跋绥夫的《沙宁》宣传的是个人主义和

享乐主义,但是郑振铎更多看重是其写实精神以及对于中国文学创作的借鉴和启发意义。郑振铎(包括茅盾)很忌讳阿氏阴郁的思想与作品中所塑造的极端的人物形象可能起到的消极引导作用,所以后来在评论时更多地采取保留态度。如郑振铎在《阿志巴绥夫与<沙宁>》(《小说月报》1923年15卷第5号)里所说的,“在他的许多作品里,如一线穿珠的红线似的把他们穿结在一处的,是他的无政府的个人思想与他的厌世思想。”但是郑振铎在译介了其小说《沙宁》后,还是以赞扬的态度称他“实是最深刻的写实主义的作家”,他所有作品的叙写,“更带着极深刻的写实精神”,所以,“……《沙宁》之介绍,对于现在中国的文艺界便又有了一层之必要;现在我们的文艺界正泛滥了无数的矫揉的非真实的叙写的作品;尖锐的写实作品的介绍实为这个病象的最好的药治品”<sup>[2]395-400</sup>。

陀思妥以夫斯基的《罪与罚》、屠格涅夫的《活骸》(包括波兰近代文学泰斗显克维支的作品)等,都把近代文学上的人道主义和基督教的“博爱”思想联系在一起。在《圣书与中国文学》(1921)一文里,周作人认为要从俄国文学中追溯了“美”和“爱”的渊源。其中写道:“现代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要从基督教精神出来,又是很可注意的事”,“我们要理解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爱的福音之文学,不得不从这源泉上来注意考察”<sup>[2]322</sup>。但是周作人看中的只是这些作家所宣扬的人道主义思想,而忽略了基督教所宣扬的“美”和“爱”思想。

文研会成员在对陀思妥以夫斯基作品解读时也出现颇有意味的误读。郑振铎在《陀思妥以夫斯基的百年纪念》一文里说:“在俄国的作家中,最富于平民精神,博爱思想,人道主义的,就是陀思妥以夫斯基”,“因此在人心萎靡的当时,陀氏的作品对于中国现代的青年,尤是一剂良好无害的兴奋剂”<sup>[10]</sup>。很明显,郑振铎是从中国实际需要出发来解读陀氏作品的,而弱化了其作品中的宗教文化内涵。事实是,陀氏作品中悲天悯人的情怀来源于基督的力量,为的是战胜对于这个现实理性世界的绝望。但是文研会这一有意识的误读,最主要的还是源于巨大的中西文化的差异,因为中国的经世致用

精神和西方的基督教精神是很难沟通的,自然不可能完全理解陀氏作品中爱的真实含义,而仅仅将之看作是对被侮辱者与被害者的同情。在《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1921)一文里,周作人就认为,陀氏的《罪与罚》本是为了攻击这种对世纪道德的漠视思想的,但未达到目的,“却在别的方面上成了一部伟大的书。”他所谓的“别的方面”,即他在同一文中所谈的“努力在湿漉漉的抹布中间,寻出他的永久的人性”<sup>[2]330</sup>。周作人把陀氏视为“人道主义”的同路人和人道主义的源泉,认为陀氏《罪与罚》是始终为挣扎于俄国黑暗制度下的底层小人物抒发不平,对黑暗制度深刻的控诉。但是正如陀氏本人所说的:“人道主义者的结果就是道德被奴役,他们的理想就是压制人性,使人等同性畜”<sup>[11]</sup>。

胡愈之发表的《都介涅夫》(今译屠格涅夫)一文,把屠格涅夫列为写实派,认为其“最大的特色,是能用小说记载时代思潮的变迁”<sup>[12]</sup>。《罪与罚》中的一个潜藏的、较晦涩主题是基督精神:只有皈依上帝,得到上帝的宽恕和恩典,人类才能获得新生。陀氏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来阐明自己对基督精神的态度:如果有人能成功地向我证明,基督远离真理,或者说,真理确实远离基督的话,那我宁愿选择基督而不选择真理。但是文学研究会主要看重该作品中潜藏的人道主义的“爱”与“同情”思想,而故意弱化了其中的宗教文化内涵。

文学研究会在译介安特列夫(包括卜鲁沙夫)这样的象征主义作家时,也给予了误读。安特列夫的作品主要是倾诉苦闷的忧郁和梦幻的忧伤,但是文学研究会却更多地从现实功利性的视角予以解读。如鲁迅再《黯淡的烟霭里·译后附记》一文里就认为安特列夫的作品“又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的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世界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的”<sup>[8]185</sup>。沈雁冰在《俄国文学杂谈》(1920)一文里甚至把安特列夫和高尔基并称为“革命的文学家”:“高尔该在十九世纪末已到衰颓的时代……;在这时,安得列夫起来,用那神秘的颓丧的文字,来描写新希望和新奋斗……”<sup>[2]316</sup>。

对于思想家列夫·托尔斯泰的重视甚于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茅盾在早期所写的三篇文章《托

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1919)、《文学家的托尔斯泰》(1919)和《托尔斯泰的文学》(1920),都重点突出托氏的思想,而不是其文学观。只有文学研究会的张闻天在《托尔斯泰的艺术观》(1921年《小说月报》第12卷“俄国文学研究”专号)一文里,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论》一书中的艺术观进行了译介,较少论及其思想观。但是总体来说,在文学研究会时期,中国译介者甚至研究者更看重的是思想家的托尔斯泰,而对其艺术家的托尔斯泰关注不够。

#### 四、结 语

从以上论述来看,可以得出四点结论:

第一,五四时期国内所处的时局,急需从域外多元的文化系统中寻找可资借鉴的资源。文学研究会大都是从接受者自身现实语境、主观倾向与文化传统出发去解读甚至误读近代俄国文学,以探求与中国的现实相契合之处。

第二,俄国19世纪文学中所具有的特色,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是极力缺乏和需要的东西。这些作品和文学研究的文学为人生、反映人道主义的理念是相一致的,所以他们在具体解读时才出现有意识的误读。

第三,文学研究对俄国文学译介、接受和误读,与五四时期以来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有着必然的联系。他们将文学视为工具和武器,“载道”重任优先于“言志”,文学的社会功用和价值超越了其美学价值。

第四,文学研究认为创造新文学乃是改造社会的需要,希冀通过倡导新文学来传播新思想。他们强调俄罗斯文学中的“真”和“美”等精神,是为建设中国新文学而不得不采用的一种方式 and 手段。

总之,文学研究会对俄国近代文学有意识的误读,是由中国当时的现实语境、接受视野、民族主义思维定势和现实主义目标所决定的。笔者赞同林精华的观点:他们“对五四时期社会观念的变化、公众意识的提高和文学创作等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难免不出现“选择译介对象的有限性或狭隘性、接受理解上的功利性,而且夸大了俄国文学的力量和价值”<sup>[6]</sup>。

## 参 考 文 献

- [1] 陈建华. 20 世纪中俄文学关系[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79.
- [2] 贾植芳. 文学研究会料:上[C].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 [3] 王锦厚. 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290.
- [4] 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72.
- [5] 雁冰. 托尔斯泰与今日俄罗斯[A]//茅盾. 茅盾全集:外国文论四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14.
- [6] 林精华. 论五四时期对俄国文学的接受[A]//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1):118-137.
- [7] 郑振铎. 俄国文学发达的原因和影响[J]. 改造,1920,3(4):22-26.
- [8] 鲁迅. 鲁迅全集:第10卷[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9] 汪晖. 鲁迅前期的思想、创作与阿尔志跋绥夫[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5):410-420.
- [10] 西谛.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百年纪念[J]. 文学旬刊,1921(19):71.
- [11] 徐田秀. 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意识分析[J]. 湖南社会科学,2004,17(2):176-178.
- [12] 胡愈之. 胡愈之译文集[M].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387.

## On the Misreading of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 in Translating and Accepting 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

LI Wen-g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May 4th period, particularly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1920's, There is a unprecedented prosperity in the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 China. Having seen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Russia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 Chinese current political trend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Zhou Zuoren, Mao Dun, Zheng Zhenduo and other outstanding literary figures of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 took the lead in advocating the translation of Russian works into Chinese. They adopted 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 of realism genre and interpreted kinds of works of Russian authors from the practical perspective. They laid emphasis on the prominent humanism and the realist style embedded in Russian literature, and intensified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to instruct China's reality. Such misreading, which was utilitarian oriented in the literary, met the domestic needs in the turning period of Chinese social culture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On one hand, it provided the Chinese new literature creation with literary resources; on the other hand it brought some negative influence.

**Key words:** Litera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 modern Russia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doption; misreading

【编辑 吴晓利】